

日本国民思维:极致还是极端^{〔*〕}

○ 奚欣华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日本民族擅长将外来事物国粹化,管理模式精细标准化,推崇客户为尊的服务意识,不断达成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日本人都会无休止地追求极致。然而这个民族也有另一面,他们执着却爱走偏锋,追求瞬间灿烂却轻视生命成为自杀王国,讲究节约、珍惜本国资源却对外部自然资源暴殄天物,作为独立的个人敬业负责,作为所属集团的个人却缺失责任心。客观地分析日本岛国历史地理环境和泛家族制度对该民族国民思维形成的影响,可以诠释其国民思维的独特性质,有助于我们很好地认识“极致”与“极端”这对矛盾是如何统一在这个民族性格的集合体之上的。

〔关键词〕日本国民思维;极致;极端;泛家族制度

一、日本国民思维意识中有追求极致和极端的倾向

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曾经轰动世界,文中揭示日本民族“好斗又和善,尚武又爱美,蛮横又有礼,顽固又能适应,驯服又恼怒被人推来推去,忠诚又背叛,勇敢又胆怯,保守又好新。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1〕} 她的话成为国际社会对日本国民性的经典诠释。从那以后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至今人们依然常常感到困惑,觉得日本人是个谜。一个民族怎么能又是菊又是刀,一群日本人怎么能又是羊又是狼? 困惑归困惑,被揭示的那些“全都有极端表现”的特点至今依旧矛盾而和谐地共存着,尤其是“极致”与“极端”这对矛

作者简介:奚欣华(1956—),硕士,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泛家族规则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影响研究”(13YJA850018)。

盾的共存更是有如电离子的正负极,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本出版的国立小学课本中在分析国民性缺点时如此表述:“生活于狭窄的岛国,国民容易陷于极端沉思,……。”^[2]历史学家天沼香更是一针见血地撰文指出:“日本人容易成为狂热分子,无法自我抑制,只会朝单一方向前进。”^[3]在汗牛充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中,这样自我反省的研究并不多见,那么他说的“只会朝单一方向前进”究竟是走极致路线还是奔极端方向?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的“极端”含义是:“事物顺着某个方向达到的顶点”。举例:“看问题要全面,不要走极端。”^[4]“某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并不明了,因此无论取水平线还是垂直线均可达到左右或者上下两个“顶点”,俗称两极,阳极与阴极,或正极与负极,极好或极差。当代汉语中往往把极好的这个“顶点”理解为“极致”。《辞海》对“极致”的解释是:“最高的造诣。昔者孔子有云:‘吾旨在《春秋》,形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5]但是如果反过来看,把一件坏事也做到了“极致”,或者做好事的初衷反而导致适得其反的糟糕结果,是不是也就从正极的“顶点”滑到了另一端?这样从词义的深层次上看,“极致”与“极端”既有相互对立、截然相反的一面,也确实存在相互转换的交集之处。

那么,为什么日本国民动辄“陷于极端沉思”“只会朝单一方向前进”?为什么会有这种追求“极致”或“极端”的纠结情愫?日本岛国的地理因素对于其民族性格和思维意识影响深远。从地理环境来说,日本列岛孤悬于大陆之外,四面环海,地震、台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频繁,1923年关东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14.2万人,2011年东日本地震引发海啸,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甚至还出现震惊世界的核危机。而自然灾害频发,财富甚至生命随时可能化为乌有,也造成普通百姓的危机感,觉得万物流转诸行无常。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古代的和歌《伊吕波》:“花虽芬芳终需落,人生无常岂奈何;俗世凡尘今朝脱,不恋醉梦免蹉跎”。^[6]歌中的“无常”有浓郁的宗教意味,也表现在诸多日本文学作品中。津田左右吉指出:“概括整篇《源氏物语》,无不描述人生虚幻渺茫及无法抗衡此种虚幻无常的命运之意。之所以在源氏家族华美的舞台背后总有一抹挥不去的寂寥,原因即在于此。”^[7]“无常”引发人们感知“物哀”的审美意识,即一种带有优美、纤细、沉静、伤感色彩的美的意识。《源氏物语》对此有浓墨重彩的描述,文中十四处提到并表达看透世间万物虚幻无常及感触的“物哀”。“无常”感与“物哀”情怀直接影响了日本民众的人生观、生死观。既然人世“无常”,就不必追求长生不老,因此人们欣赏“樱花七日红”,追求瞬间的绚丽灿烂。人世“无常”短暂,不能不倍加重视“名”、“耻”、“义理人情”,崇尚武士道“死之觉悟”,随时赴死。这可以说是一种“极致”,同时也是一种“极端”。

从地理形状而言,日本岛国地域狭长,岛内湍流急,回旋余地小,自古发生战乱,只能拼死或者归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这就决定了日本人崇尚强权政治,或做顺民,抱团战斗,集体追求成功,或死拼到底,战败就自杀,虽死犹荣,他们崇

拜的是这两种极端。二战后日本人民吃苦耐劳、团结一致重建家园,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实行制造精密化、管理规范化的制作小东西成就了大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日本经济的腾飞,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创造了日本式的“极致”。另一方面,历史上长期的孤岛生活又养成了这个民族封闭内向的性格,原有的做事认真和一丝不苟常常会偏离适度滑向另一端,变成偏执,事事计较,死板教条,钻牛角尖不会融通。人们十分依赖组织,有很强的集团意识,却习惯于让别人做决定,自己只服从。人们或随大流,盲从大家族以及集团意志,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需要负什么责任,这些负面表现导致日本国民思维易陷“极端”。

二、日本国民思维对于极致追求往往离开人文价值和人文导向

心理学家宫城音弥著书评论说:“日本人的优点是表面看似内向、计划性高、勇敢、自制力强、屹立不摇,但也有不守信用、不妥协、不服输、自我中心等缺点。日本人的疯狂行动常常吓倒外国人,这些行为看似抗争性的偏执,其实是抗争性的歇斯底里。战败时,日本人坚持抗争到底的疯狂信念霎时消失,转而对原来的敌国即美国文化产生绝对的崇拜与赞叹,并几乎支配了全日本。”^[8]一味崇拜美国文化,正说明日本国民思维中非理性的东西比较多。

(一) 偏离价值取向的“极致”无异于“极端”

身处岛国的日本民族很爱面子,往往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都重,最能代表这种国民思维价值观的是武士道“重义轻生”的精神。武士为了捍卫信义、名誉、忠孝宁可选择死,并且采取他们认为最为极致的形式——“切腹”,这种著名的自杀形式成为世界人对于日本式自杀形式的解读。在一刹那间鲜活的生命被日本刀“切腹”而死,命丧黄泉。这种由追求尊严导致失去生命的极端行为偏离了人类正常的价值观。但是在武士们看来,演出这种“切腹”生死剧可保全自身和家族的名节,保护遗属。在一般日本国民的思维中,这种求死也是一种“极致”,是失败者的“极致”。生前没法获得成功的人,死后如果能收获人们的赞叹和尊敬,也算一种成功。如今,武士道作为古典的专业化的“道”已不复存在,但“明治以后的近代武士道精神,成为奴化日本人民的精神制剂和帝国对外扩张的残忍工具,个体的贵族的武士道演变成了全民的大众的武士道”,^[9]其“忠、勇、义、信”等所谓传统武士道精神和其核心价值观已然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潜移默化在国民意识思维之中。

日本人看重强者,前倨后恭的原则就是谁比他强,也就是谁更做到了极致,他们就无条件地尊敬谁,崇拜谁。哪怕这个人昨天还是生死对头,战场上的敌人,那么立马傲慢变卑微,虚心崇拜学习。这可不是排荡于两个极端之间,而根本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二战末期“一亿白痴”的日本人没有“一亿玉碎”,在天皇的昭告声中这边刚放下屠刀还没立地成佛,那边就开始对美国人顶礼膜拜,唯美国人独尊,这就是典型写照。日本料理追求材料新鲜,营养丰富,色彩鲜艳,有“目で楽しむ料理”之称,即用眼睛欣赏的料理。但是人们并不知道

那些风靡全世界的生鱼片等代表性料理的来源。《海豚湾》^[10]揭示了这个秘密，竟然在日本风光秀丽的美丽海湾太地町每年猎杀 23000 头海豚，这太过分太残忍了。虽然该片的播放遭到国际社会广泛垢病，但相当多的日本人并不以为然，认为生吃活杀是日本料理的精髓之一。也许其他民族在某些饮食吃法上比日本更残忍，却远没有日本如此普及甚至成为民族共同嗜好。猎杀动物的冷漠与无情，究其根本，还是源于对生命的不尊重。

日本妇女穿和服的婀娜英姿成为了日本民族文化的一个美丽镜像。和服里三层外三层，奢华、高雅、漂亮、昂贵，做工精致，现代妇女只在节假日偶尔穿着，新娘要备齐这套和服家里要花费很大一笔款项。但有了昂贵的和服并不代表妇女地位高，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表面上尊重妇女，骨子里依然是男尊女卑，社会还是大男子中心，这从一些日本男性政要的言行可见一斑。大阪市长桥下彻居然声称慰安妇有必要，还怂恿驻冲绳美军玩女人。日本东京都前知事、现任日本维新会共同代表、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也支持说“军队和卖淫是不可缺少的东西。”^[11]在他们眼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玩物。而且日本社会甚至公然存在着同情强奸犯、歧视受害者的荒唐言行。当年 7 月曾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时任官房长官，他公开为本党议员太田诚一的轮奸犯罪有理的荒唐言论辩护，竟然不分是非地把罪责归咎到受性暴力摧残的受害者：“妇女之所以遭强奸皆系她们衣着太过暴露”云云。^[12]日本社会对罪犯的姑息说到底是对日本女性的轻视，对受害者的冷漠歧视纵容了性犯罪，也导致日本社会的性暴力^[13]屡见不鲜。

（二）偏激的爱国爱家是极端自私的国粹主义

爱国爱家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人类之常情，但是只爱自己的国自己的家而漠视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这本身也是属于自私的、偏执的国粹主义思维。日本政要组织修改教科书关于日本侵略的内容、修改宪法扩充自卫队军力遭到东南亚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受害国一致谴责时，绝大多数日本人无动于衷。他们骨子里并不反对政府的做法，因为他们太“爱国”了，不愿意国家有罪恶、有污点，不希望国家形象受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组织机构，二战时期日本人几乎把俾斯麦和希特勒的法宝全盘学了去，却唯独没有学会德国人民勇于反省并以负荆请罪的精神坦然向世界认罪的态度。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队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号侵略中国，在南京实施了血腥屠杀。广田弘毅在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电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 30 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14]但是至今日本国内依然纠结于到底是屠杀了 30 万人还是 10 万人的数字统计，好像屠杀 10 万人罪行就不算重，可以自我饶恕减轻罪孽似的。这集中反映了日本国民思维偏离理性，也离开了人类正常的价值观。

都说日本人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美德，其实未必，那要内外有别。在岛国泛家族规则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日本人爱家庭，爱国家，对于自家的资源精打

细算,这在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但是对于岛国之外另有所属的资源就另当别论了,在对物资占有欲的疯狂之下他们往往采取极端的手段对外围的资源进行掠夺性搜刮。

二战时期日本先在中国东三省、后在内陆各地疯狂掠夺资源运往日本。美国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共同著作《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中披露,战争期间日本皇室的“金百合计划”从南京掠夺走的黄金至少在 6000 吨。^[15]其在战败后依然觊觎外部资源,能捞就捞。前些年日本见中国的稀土价廉质好,便实施大量进口,结果稀土成为其进口的矿产资源中浪费最严重的资源之一。

据浙江日报商玉坤的日本渔业考察报告称,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人放弃近海养殖专事远洋捕捞。1984 年日本远洋渔业产量达 1282 万吨,换句话说,包括吃奶的孩子在内,当年人均消费了 100 多公斤的鱼类。1996 年《联合国海洋公约》公布后,日本人虽然不再敢如此暴殄天物,也开始重新近海养殖了,但对于外来资源的占有欲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出动军舰协助捕杀鲸鱼,对外宣称捕鲸活动是“合法的科学考察”,曾有捕鲸船 1000 余艘在太平洋海域作业,根本原因就在于鲸鱼、海豚、鱼虾贝类等海洋公共资源,捕光了都属于白捡。2014 年 3 月 31 日,海牙国际法庭裁定日本在南极海域的捕鲸活动违反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6]驳回日方提出的“捕鲸系为科学研究”的申辩,判决日本停止在南极海域的捕鲸活动。

(三)集团无责任而个人不负责的“无责任性”

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个人十分讲究礼仪和修为,待人彬彬有礼,因为个人的礼仪修为关系到家族的声誉,不能丢家族的面子。但日本是“泛家族纵式组织架构下民众依附意识”^[17]浓厚的国家,人们作为组织成员总是千方百计维护家族利益,实现家族利益最大化。作为个体的日本人讲究“义理”“人情”,作为集体的日本人更重视组织内下对上的“忠诚”,重视等级观念,“脱离了等级观念,日本社会生活就无章可循,因为等级就是日本社会生活的规范”。^[18]偏偏日本普通民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视作社会集团成员,对所属集团有极强的依附心理和极强的抱团心理。结果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是有责任感的,他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作为集体内的日本人则毫无责任感可言,历史上就形成集团无责任而个人不负责的思维惯式:“强权主义者只专心于实践权威的命令,而对行为正确与否并不太在意。这些人认为自己只是权威的代理人,对自己的言行并不负责,养成了所谓‘无责任性’”。^[19]而集团下层组织内的人也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只服从命令,不计后果,为了集团利益可以杀身成仁,亦可把廉耻心踩在脚下,因此日本民族极易成为一个被全民动员的群体。这一点,过去和今天都没有什么改变。

二战时期,裕仁天皇这位国家最高的大家长对日本军队的影响有目共睹。当他发动对华战争下达宣战诏书时,几乎所有热血青年都积极响应奔赴前线,在

东南亚地区作为侵略军犯下了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而当这位天皇未经首相东条英机同意即宣布投降时,本已决定以死效忠天皇、报效国家的日本军人却在顷刻间放下了武器。对他们来说,战争是否正义并不重要,但绝对要服从“大家长”的命令。就是说,你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但你不可以不服从命令,这就养成了人们的“无责任心”,也是日本国内“对军队的暴行是否属于犯罪至今存在分歧”^[20]的原因所在,因为至今很多人认为军队只是执行命令,不算犯罪。

2012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在社会上募集资金购买事实上原属中国领土、二战后领土归属问题暂时搁置的钓鱼岛,一时间令世界舆论哗然,更是遭到中国严厉谴责。更令人意外的是,同年7月7日日本民主党魁野田佳彦突然宣布,为了防止由东京都地方政府出资购买钓鱼岛引起不必要的争端,改为由日本政府出资购买,将钓鱼岛国有化。9月11日,日本政府与钓鱼岛所谓“拥有者”栗原家族正式签署钓鱼岛“购买”合同。此事一出,中日双边关系迅速恶化,日本旅游业因去旅游的中国人大幅萎缩而陷入萧条,中国的日本汽车销量也大幅下降,给日本本身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企图以国家购买形式图谋一日之间解决旷日持久的领土争端,与其说这反映了日本政界人士的一厢情愿、头脑简单、缺乏政治智慧,倒不如说正是这些代表日本国家集团的精英分子骨子里充满铤而走险走“极端”的特性。他们滥用职权,却又对国家、人民“无责任性”,导致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受损的恶果。

三、日本国民思维对极致的追求中也有高尚、理想的积极因素

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多基于日本民族的进取好学,擅长摄取别家所长,“拿来主义”一词藉此而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曾简明扼要地指出:“日本文化古来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21]这种对于外来事物有选择性地拿来,^[22]并持续不断地孜孜以求改进,直至登峰造极,正是日本民族的优点之一,也是日本国民思维中追求高尚、理想的积极因素使然。

(一)吸收外来文化精华打造本土特色文化的“极致”

日本民族最为称道的茶道、花道、柔道、剑道、武士道、神道教、相扑以及寿司、生鱼片等特色文化最初大都来自外来文化,历经吸收、创新,最终走向本土化、国粹化、自成体系,形成一道道独具民族特色的极致风景。

日本“茶道”吸收了中国茶文化的精髓,以“和、敬、清、寂”四字成为融宗教、哲学、伦理、美学为一体的文化艺术活动。十六世纪末茶道大家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集大成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如今细分成二十多个流派,可谓达成流派的极致。“花道”的供花同佛教一道、由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花道通过线条、颜色、形态和质感的和谐统一来追求“静、雅、美、真、和”的意境,如今花道课堂成为人们提高修养的场所。明末清初浙江人陈元赓去日本帮助创建了

柔术,后“柔道”成为日本武术中特有的一科,其以柔克刚的国技,成为世界奥林匹克的赛目之一。日本传统的“剑道”最早也源于隋唐时期日本派使节来中国学习的双手刀法,到江户时期才加进了日本本土的元素,模仿日本盔甲的样式制作出剑道护具与竹剑的基本形制,确立了日后体育剑道的雏形。现今寿司料理的前身原先只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盐腌咸鱼,后来改为一起食用的米饭腌鱼,约在公元三世纪传至日本,经千余年发展成为日本饮食文化的代表之一。裸露上身互相角力的“相扑”也起源于中国,唐朝时传入日本,逐步传承发展为日本的国技和专业竞技项目。生于日本本土的“武士道”,核心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毫无疑问也借用了中国儒家的“忠”和“勇”、印度禅宗的“生死一如”等思想。从教义上看其实也算不上真正宗教的“神道教”被日本人自豪地称为本土传统民族宗教,其实它或多或少受到公元5至8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的影响,为了与佛法分庭抗礼,创造了“神道”一词来区分日本后有的神道与先期外国传入的佛法。可以说,没有佛教就没有神道教。据2011年日本政府的统计,信仰神道教的信徒高达1.05亿人,比信仰佛教的要高出近20%,^[23]也算是创造了一种极致。

综上所述可见,使个别外来事物本土化多少有些偶然性,但将诸多外来文化均打造成本国的国粹性文化则充分体现了日本民族国民思维中追求极致的精神。

(二) 标准化管理模式下的行为极致

国内外有不少专家研究日本人做事精细的特点。事实上日本人的这个特点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回看日本的发展,真正由日本人原创并奉献给世界的东西并不多,但大到空间探测器、大型机械、重型武器、节能设备,小到大米、苹果、生活用品,一经日本人的手,其性价比就较原创者提升很多。普通消费者在乐享其成的同时,往往感叹日本人的聪明才智,其实标准化管理才是极致精神的精髓。

日本企业几乎家家都有现代管理的标准“整理·整顿·清洁·扫除·躰(修养)”。这些标准化要求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变,反而养成了凡行动都制定缜密计划、严格的操作程序,并规范执行的民族习惯,经过日常周而复始的渗透性教育,形成集体的乃至全民族达成极致的统一意识。虽然中间不免有让你竖着拖地板你就不会横着拖的机械性,但也是这种规范操作达到精确标准。比如清洁马桶的标准是打扫卫生的人能喝下去其中的水,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

被称为“狂人”的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尽管长期在西方学习、生活和工作,但这位“连头发都可以调动乐队情绪”的世界级著名音乐指挥有一次在中国内地训练某乐团时,该乐团的一位首席小提琴手接受他一丝不苟反复训练,到最后痛苦得嚎啕大哭,而他却温和而执着地说:“请再来一次。”他让所有在场的人见识到典型的日本人追求专业极致的态度。^[24]

俞天任在《东瀛住院记》一文中记述道：“这家医院在对患者提供检查的方便上下足了功夫，地面上画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线条，上面注明了心电图、X射线、B超、CT或者是核磁共振MRI，患者只要顺着线走就一定能找到地方。”^[25]作者去的“这家医院”即“德州会病院”并不知名，只是离作者最近，相当于中国的社区医院。我们可以夸奖他们的服务意识多么精深细致，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正是标准化的管理模式才使得他们将无微不至的服务概念付诸实施，认真地做到了极致。

（三）客户为尊的服务意识和创新精神达成产业升级的极致

日本的丰田、本田、尼桑等汽车产商总是根据客户要求，在节油、耐用、外观上永远追求精益求精，追求性价比，深受用户追捧，创造了汽车销售史上的辉煌业绩。

世人皆知日本由做精细小东西出名，比如钟表业。早在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军曹一级兵士多戴有手表。日本钟表业自二百年前引进欧美钟表，经历过模仿、研发、创新三个阶段，论产品性能、外观均跻身世界前列，足以与欧美最先进的钟表业相抗衡。

在中国家电自有化之前，即上个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二十年间，国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日本的家电产品，从电视机、冰箱、空调机、洗衣机到吸尘器、电饭煲、电熨斗等小家电，人们乐此不疲地购买使用，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中国是新生事物，更因为它们好用、耐用且外观漂亮。这些细小的电子产品的研发和销售成就了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目前日本在电气化机器人、动漫业、化妆品业、医疗器械等方面的不断创新，使得其在这些领域依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创新的目标就是要以最小的投入博取最大的利益，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简约。毫无疑问，通往简约的过程必然需要坚忍，调节坚忍苦痛的唯一方法在于保持内心宁静，这正与日本古典文化存有相当大的共性。因此茶道从中国传入日本，其追求“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在日本民间发扬光大了。武士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简约、坚忍和宁静。“通过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全民化的过程，简约与坚忍保留了下来，更深入到日本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26]在经营管理和创新进步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可以说，不论是否直接从事创新创造的工作，或是否宣称信奉本民族的“国粹”文化，这种孜孜以求、以达极致的精神已然渗透到日本民族的骨髓之中，形成日本国民的思维定式，并化而分解为各行各业追求极致的自觉意识，这或许也是历史上明治维新和二战后两次促成日本在较短时间内跃居世界强国的真正内在原因之一。

四、泛家族社会规则是日本国民有这两极思维倾向的组织根源

上文所举日本国民思维下的“极致”和“极端”意识，矛盾而又和谐地统一在

日本国民思维当中,有人称奇,有人说是谜,但毋庸置疑,这对矛盾体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既是基于岛国环境和竞争需求的民族特色产物,也是日本民族所特有的穷尽物事以达目的的意识综合体,而这种排荡于两极之间的精神诉求恰恰缘于岛国泛家族社会组织规则的作用。

(一)日本社会的组织基础构成及其特色

日本的泛家族制度其实就是岛国浓厚的家族式管理制度。从社会经济体上看,日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引进了美国式公司法,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但家族式内在的管理制度依然难以撼动,这和其社会政治体系组织结构不无关联。日本明治维新后根据《明治宪法》于1890年设立帝国议会,战后改成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议会虽然是政体的中心,但政府权利实际还是攥在内阁甚至首相手里。再比较两组组织结构:古代日本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是家庭—家族—领主—大名—将军—天皇。现代日本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是家庭—单位(企业)—联盟(协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天皇。显然,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层次受时代的影响,前后有着本质不同和诸多区别,但在基本链系上并无太大的改变,依然是纵向的单一链式社会组织架构。尤其是日本历史上出现的两个有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特色,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是对竞争失败对手的处置。由于岛国封闭的特殊地理条件,人的资源是岛国第一资源。岛国领土狭窄,失败者无可逃之地,胜利者要壮大队伍就不能滥杀失败者,竞争结果使得失败的家族对胜出的家族产生依附,并被收编,而不像大陆地区出现株连九族的家族灭亡。直到十七世纪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各诸侯争夺的都是人口,而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矿山资源和贸易资源却都视而不见。长篇历史小说《德川家康》对此有着清楚的描写。日本象棋还依然保留着这个历史:可以吃掉对方的兵力而变成自己的兵力。不幸得到验证的是,甲午战败后,中国北洋水师数条战舰连同水兵都变成了日本联合舰队的成员,并一直服役到二次大战。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曾写信给麦克阿瑟说:“把已经投降的对手当作在你这一方入伍者而加以保护,这是武士之道。”^[27]这位海军大将根本忘记了他们在别人国土上作为侵略军是如何对待战俘的,如何烧杀抢掠的,回到本土才想起本民族还有这一传统,并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

其二是联合体内具体关系的处理。历史上单一家族不足以应对竞争时,便出现了家族联合体,但日本的家族联合体是众多家族对某一杰出家族的依附,而不是如大陆地区出现部落。部落是众家族的一种联盟,联盟最大的特征是众家族并不丧失独立性,而只是牺牲部分独立性以便于高效率地统一行动,行动的责任依然由各家族承担。唯其如此,部落才能成为更大的部落联盟的基础。而家族的依附则使得独立性完全丧失,这是统一高效率行动的需要,也是某种责任的转移,家族对部落依附越强就越不需要负责任。因此,日本历史上出现众多的显赫家族部落,却极少出现部落联盟,即便出现也多为昙花一现。日本有绳纹文化时代的三内丸山古迹—竖居区中心广场,到弥生时代就不见其继承和发展,而代

之古坟时代的巨大古墓，证明家族依附当时已经在日本形成制度。

这两个历史的不同产生出两个特点，即：依附性极强而独立性极差；团队效率极高而个人责任感极低。

（二）泛家族规则下的社会组织日常机制催生日本国民的极致精神

现代管理学已经证明，法律确定的组织制度如果没有同一方向的运行机制是不能保证达到预期目标的，而机制是所有的制度与程序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有机制约合力。当机会出现时，这种机制就会合成力量促成人们的行为。通过对以下日本社会组织日常机制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出日本的组织机制如何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极致精神。

其一是依附意识形成“非精神的精神需求”。日本学习西方现代化，其基本制度全部西方化了，但其工作程序却依旧是充满东方的泛家族规则色彩。比如法律规定董事会是一人一票制，但在日本的株式会社里，进入董事会的股东代表在投票时却总是要习惯性依附于某一领袖，惟其马首是瞻。制度是一人一票制，而实际却是结党成派，其理由是提高团队效率，而内心深处却是推卸责任。而在民间，依附几乎成为一种习惯，就连生孩子后在家当全职太太的妇女也总要参加一至几个团体。这种思想上依附习惯和工作上的结派程序极大地抑制了个人独立性，也就产生了盲目跟风的毛病、或干好自己的事决策由别人去做的毛病。人们依附团体或组织，认认真真做自己的事，在实践中一丝不苟，越做越精细，精细到极致，精细到匪夷所思。这在组织内部已经形成风气，如果做事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就等于与组织对立。

其二是前辈意识形成“非领导的领导地位”。师傅、师兄在日语里被称为“前辈”。“前辈”不是领导，也不是精神领袖，但却是行为的教导者。显然，“前辈”的称呼是从家族演化到组织内部来的。日本企业内部“前辈”的影响十分重要，如果得罪了前辈，每天的日子会非常难熬。其实，在日本政界、军界和社会各个层面上，都覆盖着深厚的前辈程序，几乎为日本人所公认。最典型的案例是二战时期著名的中途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机动部队司令官最终人选确定一事。当时直接创建航母战斗群的是小泽治三郎中将，而山本五十六选定的是各方面都略逊一筹的南云忠一中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南云是小泽在军校里的前辈，以致后来日军四艘主力航空母舰就葬送在这位骄狂的前辈手上了。不过，从总体上说，日本独有的前辈规制及其文化，对于训练新进员工尽快掌握基本技能、融入企业或组织的文化体系、并在坚实技能基础上形成创新能力确有很大的功效。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从未否定过这种非组织的组织规则。

其三是团队意识形成“非家族的家族桎梏”。日本历史上家族形成的这种特性一直影响到走进现代化今天的日本。团队文化取代了过去的家族文化，其精神本质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近年虽有少数日本大企业改变了终身雇佣制，但在广大中小企业，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直到死亡仍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类似于家族式的团队文化，其主要内涵首先是团队利益至高无上，独立体（个人或

企业)的利益必须为其让渡;其次个人为了目标尽可各尽所能,但必须服从独立体的目标;最后是利益共享,得到最大利益者必须“关照”最小获利者。这种团队文化的存在,使得每个进入集团的成员都必须在团队内部出类拔萃,否则永远不可能成为团队的领导者,而只能成为被别人关照的角色。这种内部竞争的焦虑,无论是企业员工还是企业负责人几乎人人存在,只是程度上和层面上的差异,从而更迫使他们追求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更好。人们忠心耿耿追求极致,以致过劳死。忠心耿耿也无法追求到极致,那就只有自杀以明志。所以,日本职场的过劳死和自杀率一直居世界之最,连日本官方也不得不开始干预全社会范围的、有着组织属性的“过度加班”问题。

其四是混成意识弱化了“界限制约”。日本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总是与日本家族式传统文化混合起来,适合的留下,否则弃之。儒文化传入日本后的命运如此,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也是自然而然的混成事,就是日本的超级企业,外在的现代方式与内在的泛家族规则高度重合,也是日本人的一份创造,并为许多中国企业所醉心。二十世纪初叶,当我国的军阀们还在编练所谓“新军”使用洋枪洋炮时,日本已经组建“混成旅”实施突击。日本更是世界上第一个组织航母战斗群编队、开辟海战新方式的国家,连它的太平洋对手美国也向其学习航母海战理论。这种混成的传统在二战后的日本工商业崛起中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综合商社一改传统,以商业统领工业,形成独特的综合竞争实力,是其创造。当美国通用汽车的工程师们绞尽脑汁在电脑上画图时,丰田整车创研工作室却在把各方面人员包括一线工人集中在一起研究新一代“更快、更好、更节约”的整车系统。无疑,混成的传统对日本创新产生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这种混成,套用一句现代专用名词,即集成创新是推进团队创新走向极致的更重要的一步。

(三)泛家族制度对日本国民思维影响深远

在日本纵式组织架构下,“所有的组织无论其形式多么‘现代化’,其内部运行都有着浓烈的家族氛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有一个‘家长’或者‘名誉家长’,天皇就是全社会的家长”,^[28]所以日本天皇在国内军阀混战期间一直存续,在明治维新时期出山成神,皇室姓氏不变,可谓“万世不替”。根据日本的神道教传说,天皇是创造日本的神祇的嫡传子孙,换句话说日本子民都是天皇家族的旁支后代,自然没有儿孙造祖宗反的道理。

一统家天下,主子身份也有贵贱之分,日本著名电影《忠臣藏》因为很好地表现了对上下主子的“忠孝”和“义理”而广受推崇。故事说的是武士道历史上最受敬仰的“赤穗四十七义士”为主报仇的故事。他们是“大名”即地方诸侯小野内匠头的家臣和下等武士,在主人受辱切腹、大家族崩散的情况下,大管家大石内藏助精心策划和组织家仆杀死了主人的仇人、恶臣吉良上野介,最后为了表达对“幕府”的忠诚而集体切腹。整个事件体现了日本武士道的核心精髓——知必死而为之。他们既要拜“主人”这个神,更要拜“天皇/幕府”这个大神,在效忠主人和忠君爱国冲突时,就只能先办了主人的事尽“义理”,再自杀以明志以

尽“忠孝”。这就是日本人的多极端性的表现之一，面对心理极端矛盾时，极端的性格也只能让他们这么做，没有中间道路可选。但这个事件恰恰也反映了幕府这个更高层面、代表更大家族集团利益的权威不可抗拒，反映了家族式组织作用的强大，组织内部的严密，成员对组织的绝对服从和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超强的组织执行力。

二战日本一败涂地，国内经济也是千疮百孔，战后日本各类企业和组织努力利用并营造家文化。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很重视组织员工参加各类集体文娱活动。一方面塑造企业就是一个家的印象，争取员工的认同感，一方面利用这种认同感，使得员工为企业鞠躬尽瘁尽心竭力。为了这种情感氛围，很多日本企业在亏损的时候降薪不裁员。也缘于这种情感氛围，“家”在日本得到充分认同和尊重。人们在各类公司类型的组织里艰苦奋斗，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精髓，仅用20多年达到经济腾飞，跃居世界经济强国之林，令世人惊叹。

然而就在世人感叹日本民族摄取外来文化为己用、聪明才智达“极致”的同时，在天皇这个名誉家长之下实际掌控国家大权的日本政要却完全无视二战受害国中韩等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不顾历史事实，主持篡改了教科书，将日本“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以政府名义购买作为二战遗留问题的中国领土“钓鱼岛”，公然修改宪法扩充自卫队军力，参政议员屡屡前往供奉了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顽固地展示了一场场诸如“慰灵祭”这样的“极端”场面。尤以2013年为甚。4月23日166名国会议员参拜了春季大祭，10月17日159名国会议员参拜了秋季大祭，人数为1989年以来最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多次以首相名义献祭品后，终于忍不住于12月26日上任首相一周年之际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然参拜靖国神社，遭到全世界一片谴责。

的确，日本国内关于“军队的暴行是否属犯罪至今存在分歧”，^[29]日本民众普遍有对逝者宽容的习惯，但是日本政界高官集体祭拜靖国神社之风愈演愈烈，显然早已超出了所谓对逝者是否应该宽容的认识范畴以及宗教仪式的范畴，具有极端强烈的政治倾向，是对国际社会关于二战中日本侵略定性底线的挑衅。安倍政府“无责任性”地绑架国家意志、左右政府政策和法律、迷惑国民视听的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所谓精英分子误导日本国民加速走向集体“极端”右翼化的普遍担忧。而另一方面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在这样强权的泛家族制度下的日本国民迫于长期强权淫威越来越像缩进外壳的蜗牛，既不敢怒也不敢言。他们或奴性十足被牵着鼻子走，或事不关己漠然以对，任由国家陷入危险境地。

五、结 语

日本民族集柔美和野蛮于一身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据此说日本民族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民族显然太过了，现在我们可以明白，那不过是一个民族思维所致的两个极端而已。在无声无息中把一切都推向“极致”是日本民族的文化特性，也是其国民思维的特点。皇室贵族标志的菊花有着“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坚忍，代

表百姓心目中国花的樱花,有着“短暂绚烂绽放后飘零”的凄壮,这些成为日本民族的最爱并非偶然。柔美的极致和野蛮的极致是日本民族留给世界的永远烙印,既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也是他们民族永远的痛。如果不幸与日本在同一行业里竞争,那么我们应当记住,无论日本人表现得多么谦恭和友好,他们的心理一定在谋划着如何战胜你、吃掉你。因为,友好和竞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两回事,他们都会认真地做到极致。

注释:

- [1][美]露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白塔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
- [2][日]《寻常小学国語読本卷一二》,《第27课:我が国民性の長所短所》,日本学校图书株式会社,1923年。
- [3][日]天沼香《〈頑張り〉の構造——日本人の行動原理》,《吉川弘文館》1988年第6期。
- [4]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68页。
- [5]何休:《公羊解诂序》,《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1257页。
- [6]平安时代《伊吕波》歌,一首将日语47个假名排列次序的方法做出的“无常”歌。最早见于1079年,传说为日本真言宗祖师、后世尊为弘法大师的空海所作,他于唐·德宗年间曾寓居于长安大相国寺。
- [7][日]津田左右吉:《文学的日本国民思想研究》第一卷,洛阳堂,1916-1921年初版,岩波文库再版。
- [8][日]宫城音弥:《日本人とは何か》,《朝日新聞社》1972年第12期。
- [9][26]奚欣华:《武士道的历史区分及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分析》,《学术界》2012年第2期。
- [10][美]路易·西霍尤斯导演的纪录片:《海豚湾》,美国狮门影业发行,2009年。
- [11]《环球时报》2013年5月14日,第1版。
- [12]《日官房长官强奸怪论遭抨击》,《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4日,第1版。
- [13]奚欣华:《日本国内对“硬暴力”的认知问题研究》,《宿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11期。
- [14]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史料评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 [15][20][29][美]斯特林·西格雷夫、佩吉·西格雷夫:《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王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第48、38、43页。
- [16]《海牙国际法庭就日澳捕鲸案判日本败诉》,东方新闻“时事新闻”栏目2014年3月31日,18点53分新闻直播。
- [17]奚欣华:《泛家族纵式组织架构下民众依附意识》,《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 [18][日]川岛武宣:《日本社会の家族の構成》,岩波书店,1957年,第18-22页。
- [19][日]南博:《日本人论》,邱墩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7页。
- [21]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 [22]王凤杰:《论“拿来的”日本文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 [23]日本政府统计综合窗口,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Xlsdl.do?sinfid=000020478129>。
- [24]网易新闻网“小泽征尔的坚持”, <http://news.163.com/10/1210/11/6NHQVKFU00014AED.html>,2010年12月10日访问。
- [25]俞天任:《东瀛住院记》,《经济观察报》2011年1月3日,第7版。
- [27][美]杰弗里·佩雷特:《老战士永不死——麦克阿瑟将军传》,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
- [28]奚欣华:《解构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非制度性基础》,《世界民族》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弘 亭]